



从表象到介入 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

CONG

BIAOXIAN

DAO

JIERU

孟 强 著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WENKU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孟 强 著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VENK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从表象到介入

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

CONG
BIAOXIANG
DAO
JIER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表象到介入: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孟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8

(语言与认知文库)

ISBN 978-7-5004-7022-9

I. 从… II. 孟… III. 科学哲学—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413 号

策划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黄 湘等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父母孟凡武先生与葛秉荣女士

造就和改造事物的乐趣是源始的乐趣，我们
只能认识这个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尼采

语言与认知文库

主 编 唐孝威 黄华新

编委会顾问

王维贤 (浙江大学教授、原中国语言与逻辑研究会会长)

张 侃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张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方一新 (浙江大学)

汪丁丁 (浙江大学)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沈模卫 (浙江大学)

周昌乐 (厦门大学)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

罗卫东 (浙江大学)

唐孝威 (浙江大学)

盛晓明 (浙江大学)

黄华新 (浙江大学)

鞠实儿 (中山大学)

“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

语言是人类最显著和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不同文明的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人类对语言本身的早期关注。这些记述就是最早的语言学。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归类、解释各类具体的语言现象，二是探究语言的本质。前者是关于语言的描述理论，而后者则是语言的元理论。20世纪对语言本质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来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革命”将语言与心智关联起来，视语言为一个独特的心智器官。

尽管语言是人类最独特和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但在人类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发展中，人类展现了广泛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认知方式。认知研究过去长时期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思维水平上，如推理、决策、符号表征等内部过程。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这些内部过程可以独立于行为运动。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认知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內部过程，它还包含广泛的知觉—动作耦合、行为运动控制等非语言的认知能力。非语言的认知过程显然与语言的符号式认知不同。研究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已经发展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中心主题。

2 从表象到介入

认知科学是研究身心统一的主体是如何发展它们的认知能力和完成它们的认知活动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在不长的半个多世纪中,认知科学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其间,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的方法和主题的变化。“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概括起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我国的认知科学研究总体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内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心理学和脑研究等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特别是国家“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了认知科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的进展。浙江大学的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就是在“985”工程二期中启动的一个项目。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凝聚其中,探索在新的科研运行机制下实现多学科实质交叉和真正的学科会聚。今天,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技术集成,许多重大的创新突破来源于学科交叉中的“边缘”问题。人类的认知既是生物的、个体的现象,也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因此只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互补研究中,人类认知的深层统一性才有可能最终揭示出来。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特别策划了该文库，以期推动我国语言与认知的研究。

唐孝威 院士

2006年8月20日

前 言

自从科学参与现代性的构建进程以来，“私人科学”便让位于“公共科学”。在哥白尼或牛顿的时代，对大自然的探索可以作为业余爱好，以满足个人的求知欲和好奇之心，这种追求甚至散发着优雅的“贵族气质”。然而，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职业化的来临，科学“沦落”为一种生存手段，“平民化”在所难免。另一方面，鉴于科学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价值，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干预科研进程，产业部门则把科学技术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之一。科学俨然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一项公共事业。这并非意味着作为兴趣爱好的“私人科学”完全消失了，而是说它并不足以概括和描绘当代科学的特色。

对于这种转变，普赖斯曾经提出“大科学”这个概念，试图从科研规模、组织结构和资助幅度等方面加以勾画。但是，“大科学”还是显得不够大。鉴于科学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所有相关的群体都努力参与到科学决策的进程当中，政府、产业部门、公众、媒体都千方百计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伦理和环境诉求。结果，任何集团都无法独自掌控科学进程，垄断知识生产。也许，约翰·齐曼（John Ziman）的“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更能体现当代科学形

2 从表象到介入

态的特征。如果说在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话，那么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研究机构与外部社会结构之间的藩篱很大程度上遭到拆解。科学家必须倾听相关群体的声音，必须对相关群体负责，必须反思性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和环境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业已从“初级科学化”进入到“反思性科学化”阶段。科学在近代确立了知识的权威性，并以此为它的启蒙角色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这种权威，随着一系列的环境、军事、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出现，变得面目全非。当公众意识到，启蒙者承诺的美好未来并没有随着知识的进展而兑现的时候，批判和怀疑的矛头便指向了启蒙者作为启蒙者的合法性根据。启蒙所预设的知识与无知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被消解，启蒙者应该把启蒙原则运用于自身。这意味着，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的自主性和对知识权威的独占成了问题，作为一项公共事业，科学理应接受相关群体和部门的批判和监督。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贝克（Ulrich Beck）看来，这恰恰是深度的科学化，是彻底的科学化。我宁愿认为，这意味着作为启蒙之前提的知识等级结构的解构，怀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氛围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调，科学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不再是先天的预设，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大科学也罢，后学院科学也罢，反思性科学也罢，它们共同透露出一个信息：科学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迁，一个需要哲学家们反思的变迁。作为科学哲学家，如何从哲学上对其作出回应，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从维也纳学派算起，科学哲学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它似乎陷入了窘境。合理性相对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几乎耗尽了哲学家们

的精力，以至于无力构想出一种具有时代敏感性的哲学形式。也许，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于，以往的哲学起点出了问题。在哲学家们看来，科学首先表现为既定的知识体系，一种认识自然的手段，或者说表象世界的方式。哲学家们的共同任务是考察，作为知识和命题集合的科学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什么样的结构具有合理性，它与世界具有怎样的关系等等。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共同的前提是把科学作为表象 (representation)。表象主义 (representationalism) 的哲学范式从一开始就把科学削减为认知事业，而完全撇开文化的、社会的维度。这典型地体现在赖欣巴哈所确立的“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区分。知识只能存在于逻辑空间之中，至于发现的过程，不属于哲学的问题域，它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东西。科学的纯粹性得到了保证，但以丧失与世界和生活的关联性为代价。

如果说表象主义的认识论框架在“小科学”阶段有其合理性的话，显然，它无法应对当代的科学处境。在当代，知识并非仅仅处于逻辑空间当中，它同时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问题。不能把历史还原成逻辑，不能用理想来替代现实。科学首先是一项历史的、文化的实践活动，作为实践，它内在于既定的文化处境当中，对真理、客观性与合理性问题的任何解答都需要以此作为参照。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科学是在世存在 (In-der-Welt-Sein)，情境性的条件构成了任何科学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作为表象的科学便被作为介入 (intervention) 的科学所取代，旁观者立场让位于参与者立场。表象主义预设认知主体对于世界的超越性，介入主义 (interventionism) 则取消了任何外在于世界的超越性基点的合法性，把科学作为一项内在于文化和社会的实践事业。可以

4 从表象到介入

说，介入主义从本体论上对科学进行了重新规定，放弃了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论。为了认识世界，必须改造世界，正如哈金（Ian Hacking）所说，为了表象，必须介入。

然而，一旦把科学当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一系列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便会接踵而至。知识相对于特定的情境吗？客观性如何达成？真理如何保证？世界的独立性何存？以往的哲学之所以偏爱旁观者式的认识论，正是为了确保知识的确定性和纯粹性，没有超越性的中立者立场，知识（episteme）只能沦落为意见（doxa）。然而，这种追求真理的方式，或许可以为知识奠基，但也仅仅是理论性奠基，而从理论的有效性并不能合理地推导出实践的有效性。设想一下，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为科学确立了理论上无可争议的合理性标准，问题是，这种标准对于处于现实当中的科学共同体有效吗？能够为科学共同体所普遍遵守吗？你可以回答说，任何不遵循此种标准的科学家都是非理性的。然而，求助于“非理性”的修辞手法并不能说明问题，处于特定条件下的科学家有着自己不遵守的“理由”：资金争夺、社会压力、职业利益、政治态度等等。这意味着，哲学家构造基础的方式出了问题。哲学家构造的基础仅仅满足了哲学家本人的偏好，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和相关群体似乎并不买账。看来，基础和规范的构造不能基于超越性立场，它只能立足于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场景。任何对确定性的追求，为了确保其实践有效性，只能从科学实践出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介入主义的重要理由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论客观性、真理、相对主义与合理性等问题。

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科学规定为在世存在的时候，便默认了自然主义（naturalism）。在英美主流哲学界，自然主义伴随着第一哲学的衰败以及认知科学的突飞猛进而再次成为合理的

哲学选择。自然主义者试图借助于科学的手段来回答古老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思辨为经验研究所取代。然而，这种自然主义具有过强的科学主义色彩。大家知道，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哲学便永久丧失了对于自然的话语权，不得不把自然“割让”给科学，固守于精神领地。ratio（理性）现在只对意识领域有效，自然则受制于 causa（因果），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各样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自由与必然，事实与价值等等。在当代的自然主义者看来，精神领域同样遵循因果法则，规范和伦理问题必须基于因果法则才能得到解决。换句话说，他们试图构造一座因果帝国主义大厦，把精神领域也收入囊中。作为介入，科学认知的确隶属于自然存在领域，认识活动受制于自然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介入主义具有自然主义的气质。但是，它并不认可自然主义对因果必然性的预设。因果法则不能作为预设，而是科学实践的构造结果，并且只能在科学实践中显示出来。要超越各种各样的二元论，不能把一级还原成另一级，成功的关键在于重新构造出一种新的本体论。介入主义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作为出发点，把知识与对象作为介入的后果，有望避免主流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色彩。

当然，从实践和介入的角度理解科学，并不试图解决所有问题。面对科学形态的演变，它努力去寻找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根据。我们如果依然固守传统的科学观，可能无法对作为公共和开放事业的科学作出合理的说明。鉴于科学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甚至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权在相关的科学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科学不是仅仅由科学家所塑造，它还需把相关群体的诉求纳入议事日程。这意味着，科学家不仅要

6 从表象到介入

对知识负责，更要对社会和文化负责。也许，如此的思考方式会导致科学丧失确定性，丧失永恒的基础，选择介入作为出发点从一开始就预示了这样的后果。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相关于生存的、负责任的科学，而不是永恒的、普遍的知识体系。这也许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吧！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理论与实践	(1)
一 理论优先性的希腊起源	(2)
二 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	(7)
三 实践哲学的复兴	(16)
四 走向科学实践	(24)
第一章 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及其意义	(31)
一 海德格尔的哲学起点	(33)
二 在世存在的内涵及其意义	(39)
三 克服超越性难题	(49)
四 实践与理论的起源	(54)
五 科学：理论的还是实践的？	(62)
第二章 科学作为实践	(67)
一 表象主义批判	(68)
二 库恩的“革命”	(75)
三 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84)
四 反思“科学实践”	(94)
第三章 实验与实验室研究	(104)
一 实验有自己的生命	(106)

2 从表象到介入

二	从实验到实验室	(111)
三	建构现象	(118)
四	重构社会	(125)
五	权力问题	(132)
第四章	科学理论的实践阐释	(139)
一	科学理论在说谎吗?	(140)
二	理论与科学模型	(147)
三	法则机器、规律与能力	(153)
四	约瑟夫·劳斯的拓展	(163)
第五章	科学实践的哲学话语	(169)
一	作为绞合的科学实践	(170)
二	作为互动的科学实践	(180)
三	作为世界之形构的科学实践	(190)
第六章	科学实践的哲学后果：走向介入主义	(201)
一	认识与存在的统一	(203)
二	介入主义的认识论后果：知识的地方性	(207)
三	普遍性、客观性与相对主义	(212)
四	科学的边界在哪里?	(221)
五	介入主义作为另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	(224)
六	结语：实践话语的悖论	(228)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47)